

关于红六军团突围西征的几个问题

张尔葭^{*1}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红六军团奉命从湘赣苏区向西转移。红六军团的任务受中央的战略节奏影响,是一个动态的、逐渐清晰的过程。以任弼时、萧克、王震为首的红六军团领导人特别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为巩固和提高军团的战斗力提供了根本保证。国民党地方军阀内部、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重重,在客观上有利于红六军团的突围。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冲突在“追剿”红六军团的过程中暴露无遗,也为中央红军胜利西征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红六军团;西征;长征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7)02—0144—04

DOI:10.13715/j.cnki.jxupss.2017.02.028

红军长征包含了各红军部队齐心协力,共渡难关的历史。但长期以来,学界研究多集中于中央红军。1994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红六军团征战记》上下两册,内容涵盖90多位军团老同志的回忆文章,是为数不多的红六军团专著。

学术界现已明确红军的长征是“3+1”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的长征,再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从更广泛和抽象的意义出发,提出长征是共产党全部主要军事力量有关的、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比中央红军撤离江西更早的其他红军部队的撤离应作为必不可少的序幕。^[1]⁴也有学者从挖掘长征内涵的角度,认为不应忽略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要宣传和强化六万五千里长征里程的概念。^[2]

近几年,学界对红六军团的重视增加,学者多利用地方档案对红六军团过境的历史展开研究。其中,作为中央红军整体转移的前期工作,红六军团的突围西征是学者论述较多的内容。^②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史料文献,尝试抛砖引玉,粗略分析

¹收稿日期:2016—12—24

作者简介:张尔葭(1989—),女,湖南湘乡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当代中国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史。

²①代表性成果有:石雄将红六军团西征的经验概括为勇于抵制中央“左”倾的错误指挥,摆脱“大搬家”羁绊,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和重视群众及思想政治工作;强调红六军团为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其最后抛弃“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奠定了基础。参见石雄.红六军团西征的宝贵经验及其意义[J].中共铜仁市委党校学报.2014(4).石啸提出,红六军团通过与村民当面交流、协商谈判、张贴标语、打击土豪劣绅等方式,启发群众觉悟,执行民族政策,在西征沿途扩大苏维埃革命影响。参见石啸.红六军团西征沿途扩大苏维埃革命的影响述略[J].知行铜仁.2015(5).陈钢研究了红六军团西征面临的困难,指出中央给红六军团撤离的训令中提及的撤离背景存在多处不符合事实,认为中央决策者并非不了解情况,而是要红六军团掩护中央红军的转移;此外,中央不顾实际情况已变化的决策令红六军团多次丧失行动的机动性和灵活性,甚至造成了战斗失利。参见陈钢.红六军团突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中还有研究空间的几个问题:红六军团西征任务与中央红军西征决策;红六军团政治工作的重点及作用;过去学者可能低估的西征中国国民党方面的因素。

一、红六军团的西征任务与中共中央决策

中共中央给红六军团的最初任务,是分散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1934年春,广昌战役后,红军根据地在国民党紧逼下不断缩小,红军通过“内线”作战打破国民党“围剿”的希望渺茫,中共领导人开始计划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开会,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3] 380}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战略部署,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其中,李德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据李德回忆,他在政治局会议和军事委员会会议上,都表示可以由第六军团在湖南、由第七军团在福建开辟新的战线,在敌人后方通过威胁敌人与后方的联络来牵制和引开敌人。^{[4] 94-95}之后,军事委员会产生的决议中提出,“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4] 97}在此军事决议的指导下,7月初,红七军团以“抗日北上先遣队”的名义突围挺进福建,以期在东线牵制和调动国民党兵力。在西线,中共中央决定由红六军团分散国民党兵力。

直到7月中旬,红六军团大多数干部并不清楚中央的意图。这一时期的红六军团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威胁,正竭力保存军团有生力量。当时,湘赣苏区的中心永新城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红六军团逐渐被压缩在花溪河和石灰桥之间方圆数十里的狭长地带。针对粮食、食盐、药品的奇缺以及兵员的补充问题,军区代理司令员王震及时采取“节流”和“扩大来源”等办法,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难以挽回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败局。^{[5] 127}7月5日,任弼时指挥红六军团主力撤出金华山地区后,在牛田向红十七、红十八两师干部作关于红六军团主力准备转移战略区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其中提到“发展东南苏区,加强新的地区,扩大与加强新的主力师,实际打通与中央苏区联络”,“巩固湘赣苏区与配合中央苏区主力作战”。牛田会议虽然提到转移战略区,但并没有提到突围西征。实际上,湘赣省委和军区的原计划是“于七月中旬开始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的战斗行动,凭借山险同敌人周旋,然后再图恢复湘赣根据地。”^{[6] 37}甘泗淇后来回忆中央下令红六军团西征时说,“部队于仓促中出发,准备工作很差”,“在保守军事秘密的口号下,大多数负责干部都不知是干什么(萧克说他也不知道)”。^{[7] 72}

7月上旬,当中央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得知红六军团的湘赣苏区形势极为不利,以及听说贺龙领导的第二军团已成功地巩固了在湘鄂川交界的新根据地后,决定红六军团的主要任务是与红二军团会合并建立新根据地。据李德回忆,“我们认为,这块三角地区在战略上很重要,因为它位于长江附近,又处在中国内地几个最发达省份的交接点,可以为广泛的政治活动和军事行动提供很好的立脚点。因此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萧克,放弃第六军团的老根据地,在抗日的政治口号下与贺龙会合。”^{[4] 101}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③向红六军团下达了转移的训令,提出“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8] 355},目的在于“给湘敌以致命的威胁,迫使他不得不进行作战上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署,这将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最大限度保存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在积极的游击活动中加倍的扩大他。尽量的组织与发展湖南的群众的革命斗争,反帝国主义的与土地革命的斗争。直至由建立苏维埃政权与新的大片苏区,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为着保卫湘赣苏区及阻止湘敌组成沿赣江东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可能。”^{[8] 356-357}8月7日,红六军团全军9700余人从湘赣苏区遂川县横石山出发西征。

围西征的历史定位[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6(4).

³ ①中央军委、中革军委系两个不同机构,但常被研究者混淆。关于两个机构的关系,参见李海文. 关于中央军委与中革军委之间的关系[J]. 中共党史研究. 1990(6).

当中共中央决定整体撤离中央苏区后，红六军团为中央红军“探路”的任务才清晰起来。8月上旬，李德和周恩来就如何撤离中央苏区产生了分歧。李德主张在苏区内继续部署战略防御。周恩来主张撤退整个苏区，包括所有的中央机关、后勤部门和物资等。结果是，领导整个准备工作的周恩来实际上占了上风。^{[4] 103-104}李维汉回忆，“1934年七八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9] 37}8月20日周恩来在《红星》报上发表《新形势下的新胜利》，文章写道：“在敌后打击敌人……以开创新局面而不是返回老苏区。”^[10]这些表明，中央计划红军主力西征的目的地是湖南，故向湖南挺进的红六军团开始充当开路先锋的角色。红六军团从江西到黔东的转移历尽艰险，特别是在贵州，地形不熟，最后靠勃沙特翻译的一张在旧州天主教堂发现的法文地图才得以从贵州转战湘西。红六军团为中央红军摸清路线和军情起了重要作用。

二、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中的政治工作

担任领导红六军团西征的中央代表后，任弼时运用其丰富的政治工作理论和经验，经常巡视和督促军团的政治工作。红六军团在前方军情不明、后方没有根据地支撑的情况下，能士气昂扬地突围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富有策略的政治工作起了积极动员作用。红六军团根据战斗形势和要求，开展了富有实效的政治工作，有两个重点：一是重视红军宗旨的教育和宣传，二是重视官兵关系。

在国民党的歪曲舆论下，群众对红军的误解颇深。为了消除群众疑虑，传播革命思想，红军每到一处，宣传队不顾疲劳深入群众家中或街头巷尾，讲红军时共产党领导的新型革命军队，是工农的武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红军的唯一宗旨；连队指导员和党团骨干经常教育部队，红军打仗，不是为哪一个人，而是为了人民，为了整个工人农民，也是为了自己而战。^{[7] 254}红军在革命斗争中时刻为群众着想，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例如，部队在西延没收了二十余户地主豪绅的财产、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劳苦群众担心这些恶霸秋后算账，部队便勒令这些恶霸当面向穷苦农民许下不报复的诺言并写出书面保证。^{[7] 445}红军官兵文化水平普遍有限，理解能力弱，故单纯的政治宣讲收效甚微。红六军团常通过干部现身表率，对战士进行教育。军团战士回忆西征途中，“每到一地，政工干部带着党团员骨干去打土豪或去筹粮，找到粮食后，有群众在就当场购买，如果只有粮食不见人，我们就写个条子留下钱，请群众谅解。”^{[7] 258}

在红六军团干部的努力下，红军“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宗旨在军团内和群众中广为传播。红六军团经过政治教育和宣传，散播了革命的火种，为后来中央红军西征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时任国民党“追剿”军第一路第十九师师长的李觉回忆在贵州追截红六军团时说，“我们虽然补给比较方便，但在长途行军之后，也是相当困乏，必须加以整补。而这一地区，军民关系太坏，我们的补给也感困难。当时黔军军纪之坏，在反动军队中可算是名列第一，官民没有不抽鸦片烟的，真正是每人都有两支枪；‘军行所至，鸡犬不留’，每到一地都要大肆抢掠。所以当地人民，只要看见军队，就都逃入高山岩洞中去避难。我们每到一地，都是人烟绝迹，必须由当地县政府派人到处寻找地保人员负责，才能办理补给。”^{[11] 119}国民党恶劣的军民关系与红六军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军团行军途中，常有群众主动为红军带路、挑担、献物。不仅如此，不少青年还加入了红军组建的地方武装，为红军突围贡献了力量。

红六军团的另一政治工作重点是构建和谐官兵关系。军团的干部和普通战士在政治上是平等的，气氛上是民主的。据战士回忆，“那时，我们这些长期饱受阶级压迫的农家子弟，参加红军后精神上十分愉快，特别是那些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战士感受更深，他们觉得红军和白军如同两个世界，虽然红军各方面的条件和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他们精神上得到了解放。”^{[7] 255}军团干部还特别注意关心战士的心理变化和物质生活。在艰难的西征中，红六军团的官兵互相关心，互相信赖，互相扶持。由于红六军团的红军战士大多不知道此行西征的目的，军队也有“相机宿营”的习惯，于是，战士间产生了迷茫焦虑的情绪。军团干部及时发现了问题，于是，“行军途中，政治机关人员带着宣传队员和连队干部站在部队开进的路旁……不仅鼓舞了部队士气，也及时把敌情、战情和领导意图告诉大家。到了宿营地，指导员和党团骨干不管有多累，带人找米找柴，帮助炊事员尽早开饭……帮助战士挑脚泡；还要检查战士睡得好不好”。^{[7] 257}这些做法有效地消除了军团中急躁消极的负面情绪，重新唤起了战士革命的斗志。

后来，红六军团还利用政治工作的优势帮助了红二军团，为将两军团拧成一个强有力的团体起了重要作用。杨炳章曾评价红二军团，“自1930年李立三时期的东征失利之后，特别是1932年经过了第四次反围剿后的长征之后，贺龙的军队已基本上丧失了政治活力。一方面，贺龙本人是一个军事实用主义观念很重的人；另一方面，夏曦又极其注意思想意识，难以切合实际人事。”^{[11] 67}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后，任弼时发现连队还没有党、团支部，大部分政治工作系统还未建立。于是，任弼时将富有政治工作经验的红六军团政治部和保卫局完整地调给了红二军团，从红六军团调方理明、袁任远分任红二军团第四、第六师政委，抽调一批红六军团的政工干部建立了两个师的政治部，迅速普遍地建立连队的党支部。在红六军团的帮助下，红二军团中“党的基础初步建立，党的生活开始走向健全化的道路”，“指战员的积极性正在发扬，肃反扩大化造成的恐怖现象逐渐消失，战斗员的胜利信心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增强了”。^{[12] 93}

三、国民党的内部斗争与红六军团突围西征

红六军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胜利突围，从红军角度分析，是因为红军将士的昂扬斗志和任弼时等领导敢于突破中央“左”倾指挥。但以往的研究常忽略从国民党角度考察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从国民党内部斗争的角度出发，国民党地方军阀之间、蒋介石与国民党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在追截红六军团时凸显并激化，为日后他们各怀心思、拒绝合作埋下了伏笔。可以说，红六军团的突围西征是中央红军西征的一次预演。在红六军团西征途中，蒋介石与黔军和桂军的矛盾尤为突出。

1934年8月，出于对自己腹地受袭的危机感，黔军与湘军、桂军合作堵截红六军团。对于桂军，其内部派系林立，“首领”王家烈实际上能号令的兵力有限，并且时刻严防被其他军阀取而代之。他曾分析道，“犹国才割据盘江八属；侯之担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各县。他们对我口头上表示拥护听命，实际上我不能直接调动其部队”。^{[11] 180}在黔东地区，王家烈因为担心被犹国才从西路袭击而极力缩短战线。因此，只有第一路、第五路及王家烈亲自指挥的部队与红军作战，吴剑平、蒋在珍、侯之担等部均驻原防区不动。王的嫡系何知重部驻防安顺一带，主要任务是防犹国才。^{[11] 123}1934年秋，王家烈被迫“以省主席一职界犹代理”^{[11] 191}来换取对方与自己合作“剿共”。在军队部署上，王家烈将守卫贵阳作为首要任务。当时，湘军按照王家烈电报指定的位置联络黔军，希望三军合力在镇远一带“追剿”红六军团，结果发现“黔军根本没有派出部队”，仅是“集结在贵阳附近的龙里、贵定一带”。^{[11] 118}

相较于黔军的内部混乱，桂军白崇禧、李宗仁则时刻担心蒋介石借“追剿”红六军团将势力不声不响地渗透到广西。1934年5月，蒋介石令何键于湘南地区赶筑公路、飞机场、堡垒线、电话线，蒋介石进军两广的传言引得人心惶惶，广西银行发行的“桂钞”兑换率也大受影响。6月，白崇禧在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商讨对策。蒋介石为安抚他们，派何键飞抵广州，同三人解释蒋介石在湘南的举动乃针对红军西进。送走何键后，白崇禧直言蒋介石的“围剿”计划“企欲力逼红军南下，随后中央军跟踪追击，借此统一西南”，且“张定璠也从上海发来过这样的信息”。^{[13] 170}因此，桂系军阀只是希望能逼红六军团尽早离开广西，不愿意在“追剿”红军的战事中过多消耗自身力量。当红六军团到达旧州时，广西派廖磊率桂军4个团，协同黔军和湘军围攻南行的红军。当时，廖磊甚至对黔军将领说：“我们只要他们（指红军）不下湖南，不进贵州就得啦，何必去硬拼呢？部队打光是得不偿算的。我建议黔军远远的追，放出一条路给他们走，他们过四川，上云南，我们都听便。”^{[11] 125}

“追剿”红六军团的过程中，地方军阀再次确认了对地方势力早有所图的蒋介石并非单纯“剿共”，而是想“借刀杀人”“一石二鸟”。军阀们普遍认为红六军团的目的旨在探路，故中央红军西征时，除了湘军何键担心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在湖南建立新的根据地外，黔军和桂军都判断中央红军不会在境内停留，只是借道经过，所以为保存自身实力，并未投入太多精力“追剿”红军。桂军最终还确定了对中央红军的作战总方针是“送客”，即：“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从红军后卫部队做文章，以送客早走，并敷衍蒋介石。”^{[11] 133}白崇禧、李宗仁自知已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故他们更希望用“追剿”红军来拖住蒋介石，为自己再谋计策赢得时间。

总之，通过理清时间脉络，笔者认为红六军团突围西征的任务是动态发展的。从最开始牵制国民党围剿苏区的兵力，到后来与红二军团会合、开辟新的根据地连接江西和四川，再到最终为中央红军一探国民党虚实、摸清西征路线。这是一个根据中共中央决策不断丰富、发展和清晰的过程。红六军团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有效地宣传了革命的思想，鼓舞了士气。不仅动员了广大群众，还有效改造了红二军团，从而实现并超越了其最初强实效性的政治工作目的。同时，不应忽略红六军团成功突围中的国民党因素。国民党内部的彼此猜忌和斗争消耗了围追堵截红军的力量，在客观上为红军创造了突围的机会，更为后来中央红军的突围埋下了伏笔。

参考文献:

- [1] 杨炳章著.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M]. 郭伟, 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 [2] 石仲泉. 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和红军长征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2(5).
- [3] 朱德年谱新编本(上)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 [4] [德] 奥托·布劳恩著. 中国纪事(1932—1939) [M]. 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 [5]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王震与湖南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 [6] 贵州省革命文物、历史文物调查征集办公室. 黔山红迹——红军在贵州的革命活动 [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1.
- [7] 本书编辑组. 红六军团征战记(上) [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4.
- [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 [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 [9]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 [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0.
- [10] 周恩来. 新形势下的新胜利 [N]. 红星. 1934年8月20日.
- [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审组编.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册) [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
- [12]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任弼时选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
- [13] 程思远. 白崇禧传 [M]. 北京:华艺出版社, 1995.